

[英] A·J·P·泰勒 著



潘人杰 朱立人 黄鹂 译

# 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起源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林文勋 主编



# 中印边界问题、 印巴领土纠纷研究

吕昭义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英)泰勒(Taylor, A. J. P.)著;  
潘人杰, 朱立人, 黄鹂译.—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12  
(辞海译丛)

书名原文: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SBN 978-7-5326-4031-7

I. ①第… II. ①泰… ②潘… ③朱… ④黄…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源—研究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805 号

---

总 策 划 彭卫国 潘 涛

责任编辑 王国勇

助理编辑 仇晓君

装帧设计 姜 明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 A·J·P·泰勒 著

潘人杰 朱立人 黄鹂 译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网 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mm × 965 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74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031-7/K·934

图 字 09-2012-273 号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

## 《辞海译丛》缘起

---

《辞海》自 1936 年初版以来，风行宇内，历久弥新。本社有幸，负《辞海》修订出版之责，于“十年大修”外，近年亦颇致力于《辞海》品牌之延伸，《辞海译丛》应运而生焉。《译丛》旨在遴选域外学术著作之适于大众阅读者，移译为中文，俾国人快捷获取新知。选目原则有二：一为冶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既广见闻，更启深思；二为融学术性与普及性为一体，既具高度，复饶趣味。

《译丛》自 2011 年起陆续推出。初期选目以科学人文类译著为主，今后将尽力拓宽领域，向读者奉献更多佳作。寄望各界博雅君子，以爱护《辞海》之心，垂注《译丛》，助我教我，共育此书苑新葩。

上海辞书出版社谨识

2011 年 6 月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作者简介 A·J·P·泰勒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1906—1990)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生于兰开夏郡。早年在贵格派学校学习。1924年入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攻读历史。后赴维也纳深造,专攻欧洲近代史。1930—1938年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并长期在该校讲授欧洲近代史。其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所做电视讲座也广受好评。治学严谨,著述丰富,1961年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引起极大争议,1963年后牛津大学不再续聘。后在伦敦一些院校任教。去世时,《时代》杂志称其为“英语世界最具争议,而且必然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亦有人称之为“当代的麦考莱”。

---

# 再思考

---

我写本书是为了满足我对历史的好奇心；用一位有更大成就的历史学家的话说，是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历史学家们往往不喜欢所发生的事，或者希望它原本以不同的面貌发生。他们对它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按他们之所见陈述事实，毋需担心这是否会冲击或确认现存的偏见。或许我的这种设想未免太天真了。我也许本应提醒读者：我不是作为法官来研究历史的；并且当我谈到道义的时候，我是指我所写的事件发生那时的是非之感。我不作自己的道义裁决。因此，当我写道(正文第 23 页)“凡尔赛和平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正当性”时，我的意思不过就是说，德国人没有把它看作是“公平的”解决办法，并且协约国的许多人，我认为不久是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我是以什么身份抽象地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又是从什么样的立场——德国人的立场，协约国的立场，中立国的立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凡尔赛和平的缔造者中有的人认为它是道德的；有的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有的人却认为它既不道德又非必要。最后这类人有史末资、劳合·乔治、英国工党及许多美国人。这些道德上的疑问后来促进了推翻和平的解决办法。此外，关于慕尼黑协定我写道(正文第 189—190 页)：它“是英国生活中一切最美好、最开明的事物的胜利；是那些宣扬各国人民之间平等正义的人们的胜利；是那些敢于谴责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缺乏远见的人们的胜利”，我也许本应像阿蒂默斯·沃德那样补充说“这里开个完校”。\* 然而这不完全是玩笑。过去多年，博学多闻的和最认真的国际事务学者争辩说，在德国人得到已给予了其他民族的自决以前，欧洲是不会有和平的。慕尼黑协定部分地是他们作品的

---

\* 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 1834—1867)，美国著名幽默作家查尔斯·法勒·布朗的笔名，他创造了阿蒂默斯·沃德这个巡回戏班领班的角色，并以他的名义撰文和演讲，其幽默笔调的特色是巧妙的双关语和粗劣的错别字，演讲时则毫无表情。在英文里“玩笑”是 joke，他却写成 goak。——译者



后果,虽然它的形式不受欢迎;并且如果人们不认为希特勒的要求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它的缔结本来会是更加困难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位万灵学院研究员\* 问贝奈斯总统,他是不是认为:倘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只有假定不到 150 万德意志人的话,它本来会更加强大的。“绥靖”这个幽灵竟徘徊游荡得如此之久。事实上,没有什么折中办法: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 350 万德意志人,就是一个也没有。捷克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识到这一点,就把德意志人赶走了。赞成或谴责希特勒的要求不是我的事;我只解释为什么他的要求得到如此广泛的赞成。

倘若这一点让猜想我的著作是设法为希特勒“辩护”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失望的话,我感到遗憾。然而我不赞成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他们抱怨我的著作受到希特勒的前拥护者的欢迎,不管错误与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被用来反对一本历史著作的不光采的论据。一个历史学家不可含糊\*\*,即使他的著作支持和安慰女王的敌人(可是我的著作没有这样做),乃至人类的共同敌人。对我来说,我甚至会记录表明是支持英国政府的事实,如果我发现有事实可记录的话(再开个完校)。根据记录,奥地利危机是舒施尼格而不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根据记录,是英国政府而不是希特勒率先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这不是我的过错;英国政府 1939 年给希特勒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打算强迫波兰人作出让步超过打算抵抗德国,这也不是我的罪过;倘若这些事表明是支持希特勒的,过错属于从前的传说,历史学家们未加考察就重复这些传说。这些传说有着长久的生命。我怀疑我也重复过某些传说。例如,我一向相信下面的说法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把恰恰叫到柏林。只是当本书在出校样时,我才再次查看记录,发现是恰恰要求前往柏林的,而不是相反。无疑,其他

---

\* A·L·罗斯先生,像在他的著作《万灵与绥靖》中所描述的。

\*\* 意指要根据事实秉笔直书。——译者

传说则疏漏了。

破除这些传说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这是为历史真相效劳，我的著作只应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人们想从其中引出的政治寓意而受到质疑。除在认为希特勒用了和通常被认为是他所使用的方法不同的方法这个次要意义上之外，本书对“修正主义”不是一项贡献。在战争罪行或无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我从未看出有任何意义。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 1866 年普奥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作为一个平民，我认为追求伟大和统治，这一切是愚蠢的；我希望我的国家不参与这种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承认大国将来还是大国。我的著作确实和希特勒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和英法两国有关系的。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它们曾掌握决定大权。十分明显，德国将力求再次成为大国；1933 年以后，它的统治明显地具有特别野蛮的性质。胜利者为什么没有抵制它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回答：胆怯；昏庸糊涂；道德上的疑虑；或许想使德国的力量转而反对苏俄。然而，无论答案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个重要问题，我的著作要围绕它铺叙，虽则当然也要围绕另外一个问题，即他们为什么到最后才进行抵抗呢？

至今仍有一些批评者在希特勒身上大做文章，把战争责任或与战争搭边的什么行为全部归咎于他一个人。因此我将用再多一点的篇幅，纵然不是以论战的态度讨论希特勒那方面。我不想争输赢，而只想弄清事情。我认为，当前对希特勒的看法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他为一场大战而要打一场大战。他无疑也模模糊糊地想到战争的结果：德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强国，他自己将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式或拿破仑式的世界征服者。但主要的是，他要战争是为了全面毁灭人和社会，而战争是会造成这个后

果的。他是一个疯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第二个阿提拉。另一种看法认为他比较理智，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有建设性。按照这种看法，希特勒有一个他坚持不懈追求的、首尾一贯的、独出心裁的长远计划。为了这项计划的缘故，他谋求政权；这个计划决定了他的一切外交政策。他打算通过击败苏俄，消灭其所有居民，以及然后让德国人移民于这片无人领土的途径，使德国成为东欧的大殖民帝国。1亿或2亿德国人的德意志帝国将存在1000年。顺便说一句，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没有称赞我的著作，不禁使我惊奇。的确，如果希特勒是计划对苏俄打一场大战的话，那么他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乃是一个错误。很明显，这里有那么一点是我不理解的。

于是，希特勒自然是对他所做的事好好思索过的，极像学术观察家们力图把一贯性加进当代政治家的行为。也许世界本来会避免许多麻烦的，倘若希特勒在德国某个相当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有份工作的话，在那里他可以无害地思索他的余年。事实上，他卷入了纷争的世界。我认为，在这些纷争里，他是在利用事态的发展而非遵循精确一贯的计划。在我看来，他如何在德国执政的历史，是与他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相关的。他不断宣布：他要夺取政权，然后干一番大事。许多人都相信他的话。希特勒借以夺取政权的精心策划的阴谋，将是为他编造的第一个传奇，也是第一个要破除的传奇。根本没有什么长远阴谋；根本没有夺取政权。希特勒不知道他将如何执政；他只有一个信念，即他会达到目的。巴本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者靠密谋把希特勒扶上台，认为他们已把他俘虏了。他利用了他们的密谋，又一次不知道他将如何逃脱他们的控制，而只坚信他会想出办法获得成功的。这个“修正”并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虽然它使巴本及其同伙名誉扫地。这完全是为修正而修正，更精确地说，是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貌。

上了台的希特勒再一次不明白他将如何使德国摆脱萧条，他只是有决心将这样做。有很大复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世界情况在希特勒获得

政权之前就早已开始普遍好转。希特勒自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反犹太主义。我认为，这是他从在慕尼黑发迹直到他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所始终真正确信的一件事。他鼓吹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本来会使他在一个文明国度里丧失支持，更不必说取得政权了。从经济上说，反犹太主义是不恰当的，确实是有害的。他做的另一件事是鼓励政府对公路和建筑投资。据唯一的一本考察了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重复希特勒和别人口说发生了什么的著作说，\* 德国的复苏是私人消费和非战争型的投资恢复到1928年和1929年的繁荣水平造成的，重新武装与它没有什么关系。直到1936年春，“重新武装基本上是个神话”。\*\* 事实上，希特勒没有实行任何准备好的经济计划。他做了送上门来唾手就得的事。

这一点在国会纵火案历史中同样得到证明。世人都知道这个传奇。纳粹党需要一个采用政治独裁的非常法的理由；他们自己放火焚烧国会大厦，以便制造这个理由。或许是戈培尔布置纵火的，或许是戈林；希特勒本人可能事先不知道这项计划。总而言之，纳粹党想方设法干了这件事。我断然认为，这个传说现已被弗里茨·托比亚斯戳穿了。\*\*\* 纳粹党与国会大厦的焚烧毫无关系。荷兰青年范·德·卢勃一个人干了这件事，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对此大吃一惊。他们真的以为是共产党人纵火的；他们所以采用非常法，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受到共产党暴动的威胁。无疑地，有一份准备好的要逮捕的人的名单。但这份名单不是纳粹党拟订的。它是戈林的前任、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拟订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不是为希特勒“辩护”，只是对他的手法加以修正罢了。他期望获得一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这个机会果然出现

---

\* 伯顿·H·克莱因，《德国经济上的战争准备》(1959年)。克莱因先生是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

\*\* 同上书，第16—17页。

\*\*\* 弗里茨·托比亚斯，《国会纵火案》(1962年)。

了。当然，共产党人与国会纵火案同样毫无关系。但希特勒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他所以能够这样有效地利用共产党危险，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相信此事。这也提供了与希特勒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相似的事例。当其他国家认为希特勒在准备对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同样确信这些国家企图阻止德国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大国。他的信念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少，英法两国政府就因没有及时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而常常受到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对希特勒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的解答。与其说他要战争，不如说他预料到要发生战争，除非他能用某种独创性的手法避免它，就像他在国内避免了内战一样。心怀不良动机的人，不难把这种动机归于别人，希特勒预料别人会做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本来也会做的事。英法两国是“为仇恨所驱使的敌手”；苏俄在阴谋毁灭欧洲文明，这是布尔什维克确实常常提出的空洞夸耀；罗斯福企图毁灭欧洲。希特勒确实命令他的将领们备战。然而英国人也这样做了，就此而言，其他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备战是总参谋部的职责。它们从自己政府接到的命令，表明有可能发生它们应该准备的战争，但这种命令不能证明有关政府已决定打仗。从1935年起，英国的所有命令完全是针对德国的；而希特勒的命令仅仅关心使德国更强大起来。因此，我们如果打算（不当地）根据军事计划来判断政治意图的话，英国政府似乎会着手同德国战争，而不是相反。不过，我们当然把宽大的解释应用于我们自己政府的行为，而不把这样的解释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恶棍；然后找出证据，证明他有恶意，但他们不会利用这种证据反对别的人。他们为什么应用这种双重标准呢？唯一的答案是，因为他们首先假定希特勒心怀叵测。

根据军事计划推断政治意图，那是危险的。例如，有的历史学家根据1914年之前英法军事会谈推断英国政府着手准备同德国的战争。别的

历史学家,我以为是比较明智的,他们否定可以作出这种推断。他们争辩说,计划是预防措施,而不是“侵略蓝图”。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常常被解释成后者。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38年11月30日,凯特尔把他奉希特勒命令起草的意大利德国军事会谈草案送给里宾特洛甫。草案第三条规定:“谈判的军事政治基础。德国和意大利对英法战争,以首先打败法国为目的。”\* 一位尽责的批评家声称:这提供了关于希特勒意图的明确证据,因此推翻了我的全部论点。可是,当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将领会谈时,除讨论对英法两国战争外,他们还能谈论什么呢?这是意大利很可能被卷入的唯一战争。正是在这同一时刻,英法两国将领也在讨论着对德意的战争。然而,指出这个事实并没有反对他们的意思,更谈不上是反对他们的政府。凯特尔草案后来的发展过程是有启发性的。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人一直催促举行军事会谈。草案拟订以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时,会谈仍然没有举行。意大利人越来越急不可耐。3月22日希特勒下令说:“军事政治的基础……应暂时推迟。”\*\* 会谈最后在4月4日举行。凯特尔记录道:“由于意大利施加压力的缘故,会谈多少突然地开始了。”\*\*\* 结果人们弄清楚:意大利人非但不要战争,而且想强调最起码要到1942年他们才能作好战争准备;德国代表同意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个奇怪的指令仅仅证明(倘若它能证明什么的话):希特勒此时对英法战争是不感兴趣的;而意大利对战争则根本不感兴趣。或许它还表明,历史学家应小心,不要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下,只抓住文件中孤立的片言只语。

---

\* 凯特尔致里宾特洛甫,1938年11月3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8—1945年》,D辑,第4卷,第411号。

\*\* 凯特尔的指令,1939年3月2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8—1945年》,D辑,第6卷,附录I。

\*\*\* 凯特尔的报告,1939年4月4日:同上书,附录III。

当然,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政府只想使事情保持平静,而希特勒则想挑起事端。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奴隶条约。这完全取决于立场。战胜国想作某些缓减而保持胜利的果实,不过他们做得效率低下。战败国想消除其失败。后者的这一奢望,不论“具有侵略性”与否,都不是希特勒所特有的。所有德国政治家,1918年结束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施特莱斯曼都有这一奢望。谁也没有精确地界定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什么意思;希特勒也没有作出精确的界定。它涉及恢复当时丧失的领土;重建德国从前通过与奥匈帝国联盟而获得的对中欧的支配地位;当然还有终止对德国军备的一切限制。具体的条件是无关紧要的。全体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设想德国将成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一旦它消除了她的失败的话,不论这一着是靠战争还是用别的方法实现;这种设想在其他国家普遍都有。“解放”和“支配”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不能分开它们。它们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词而已;只使用特定的词决定着希特勒是民族正义的战士,还是欧洲的可能征服者。

一位德国作家\*最近批评希特勒想全然恢复德国成为一个大国。这位作家争辩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德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独立强国;而希特勒却去尝试,那是愚不可及的。这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损伤了所有卷入的大国,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参战;他们后来全都继续试图成为大国,也许这同样是荒谬的。总体战争也许是任何一个大国力所不及的。现在,即使准备这样的战争,也会使企图做这种准备的大国有灭亡的危险。这不是新鲜的事。在18世纪,腓特烈大帝在努力成为大国的一举中,把普鲁士引到崩溃的地步。拿破仑战争把法国从她在欧洲的崇高地位跌落下来,从此再没有恢复她从前的伟大。这是个奇特的、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虽然做一个大国的目的

---

\* 沃尔夫冈·绍尔,《民族社会主义的夺权》(1960年)。

是要能打一场大战,但继续做个大国的办法却是不要打一场大战,或在有限的规模上打一场大战。这是英国伟大的秘诀,只要它坚持海战,并且不企图成为一个大陆型的军事强国。希特勒并不需要一位历史学家的教诲来懂得这一点。德国没有能力打一场长期战争是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主题;因为有个危险威胁着德国,倘若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反对它的话。在谈论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希特勒比德国的将军们更加聪明,后者想象:他们如果使德国回到它在1918年3月鲁登道夫攻势之前所占据的阵地,一切都会很好的。可是希特勒并没有汲取这样的教训:德国要做一个大国,就是愚不可及的。相反,他打算运用智谋避开这个问题,极像英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依靠海军力量,而他则依靠诡计。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的果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其他大国认为他们面临要么进行总体战要么投降的选择。起初它们选择了投降;然后又选择了总体战,直到希特勒最后灭亡。

这并不是猜测。它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战争期间有关德国军备的档案确凿无疑的证明。这本该在很久以前就是彰明昭著的事,倘若人们没有被两个错误所蒙蔽的话。战前,他们只听希特勒说了什么,而不考察他做了什么。战后,他们想把所发生的一切事的罪过都加诸于他,也不管有没有证据。例如,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是希特勒开始对平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其实这是英国战略指挥者开始的,正如他们当中某些比较诚实的人所夸耀的那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记录就在那里,可供任何想利用它的人查考,对这项记录伯顿·克莱因先生曾作了冷静的分析。我早已援引了他对希特勒执政头三年所做的结论,直到1936年春天,德国重新武装基本上还是个神话。这不仅是说初期的重新武装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没有使实力增强。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着手初期的重新武装。希特勒在与通常想象的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欺骗了外国和德



国人民。他，确切地说是戈林，宣布：“大炮第一，黄油第二。”事实上他把黄油置于第一的地位，大炮置于第二的地位。我从克莱因先生的著作中随便列举几个数字。1936年按丘吉尔说，两项单独的预算规定德国重新武装的支出每年为120亿马克。<sup>\*</sup>但实际数字在50亿马克以下。希特勒自己宣称，纳粹政府在战争爆发前用于重新武装的钱为900亿马克。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政府战争和非战争的全部支出总计也不会比这多多少。重新武装在到1939年3月31日终止的6个财政年度中开支了约400亿马克，到战争爆发时花了约500亿马克。<sup>\*\*</sup>

克莱因先生讨论了德国重新武装在这样有限规模上的理由。首先，希特勒不希望由于降低德国老百姓的生活标准而削弱他的声望。与不重新武装相比，重新武装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妨碍平民生活标准的更快提高。即使如此，德国人也比他们从前的境况好多了。此外，纳粹制度是没有效率的，腐败的，混乱不堪的。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愿增加税收，然而又对通货膨胀感到惊恐。即使解除沙赫特职务也没有真正动摇财政限制，虽然他以为会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所以没有做大规模的战备，完全是因为他的“战争观念不需要战备”。“说得更确切点，他计划用零碎的方式——用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sup>\*\*\*</sup>这也是我从对政治记录的研究中独立得出的结论，不过我觉得希特勒希望完全不用打仗就达到目的。我同意，在他的思想中，在政治机巧和例如进攻波兰这样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他唯一没有计划的事，就是常常归咎于他的这场大战。

假装准备大战而事实上不这样做，是希特勒的政治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他敲响警钟的人例如丘吉尔，不知不觉地代他做了他的工作。这

---

<sup>\*</sup>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第226页。

<sup>\*\*</sup> 伯顿·H·克莱因，《德国经济上的战争准备》（1959年），第17页。

<sup>\*\*\*</sup> 同上，第26页。